

文章编号: 1005—0523(2004)03—0101—04

关于第五次反“围剿”中一个问题的论证

陈晓蓉

(江西人民出版社, 江西 南昌 330002)

摘要: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主张,红军伤亡重大,根据地日益缩小,此时又发生“福建事变”。根据敌我态势及国内形势的变化,有同志提出,应利用此机会,红军主力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迫使敌人回援江浙,并援助“福建事变”,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可是“左”倾机会主义者拒绝这个正确意见。战争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有同志再次提出:红军主力应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消灭之。对于上述向苏浙皖赣出击和向湖南中部前进这一建议究竟是谁提出的?党史界说法不完全一致。本文以史实为依据,作了实事求是的论证。

关键词:第五次反围剿;左倾机会主义;态势;福建事变;出击;抗日救亡运动

中图分类号:F234.5

文献标识码:A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二百架飞机,自任总司令,对我苏区实行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排斥了毛泽东的领导,完全听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主张,一开始就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而当红军在广昌战役中失利后,他们又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结果在一年多时间内,红军始终在敌人日益压缩的碉堡线里打圈子,伤亡重大,根据地日益缩小。1933年11月发生“福建事变”,十九路军公开宣布反蒋抗日,和红军达成了反蒋抗日的协定,出现了打破敌人围攻的有利条件。这时,有的同志提出应该利用此机会,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堡垒线,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根本重地,迫使敌人回援江浙,并援助福建事变,推动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和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计划。可是“左”倾机会主义者拒绝接受这个正确意见。结果坐失良机,敌人摧毁了“福建人民政府”后,又从容调转头来,重新压迫根据地。战争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有同志再次提出:红军主力应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

江西敌人至湖南消灭之。这一正确主张,又为“左”倾分子所拒绝,结果,此机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对于上述向苏浙皖赣出击和向湖南中部前进(以下简称“出击计划”)这一建议究竟是谁提出的?不同的党史教科书有不同的说法。现举几本由教育部审定、推荐的党史教科书的几种说法为例。

《中国革命史讲义》(胡华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年第1版)很明确地提出,这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书中说:“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毛泽东曾多次提出粉碎敌人围攻的正确方针,但都被‘左’倾机会主义拒绝了。福建事变时,毛泽东提出在红军不能从内线打破敌人围攻的情况下,红军主力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建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的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迫使敌人回转江浙,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是‘左’倾机会主义者拒不接受,于是围攻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被摧垮了。仗打了一年,毛泽东又提出,红军已不利于出击浙江,但还可以

收稿日期:2004—04—16

作者简介:陈晓蓉(1962—),女,浙江临安人,江西人民出版社副编审。

调动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江西敌人至湖南消灭之。‘左’倾机会主义者又拒不接受。这样,打破第五次围攻的希望就最终断绝,只剩下长征一条路了。”^[1]

但是1982年同样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讲义》对此“出击计划”提得非常含糊:

“当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在福建前线参加‘围剿’的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领导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在遭到红军打击之后,逐渐认识到跟随蒋介石同红军作战是没有出路的;同时由于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政策的影响,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推动,于1933年11月,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公开宣布同蒋介石分裂,在福建省成立了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签订了抗日停战协定。这时红军虽已不能从内线打破‘围剿’,但是如果利用这时机,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京、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就能迫使进攻赣南闽西之敌军回援江浙,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能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是‘左’倾冒险主义者根本看不到由于日本侵略中国而起到的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不懂得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竟把同蒋介石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的中间势力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竟把福建事变说成是‘反革命派别骗人的把戏’,拒绝上述正确主张。结果第五次‘围剿’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围攻下,又没有得到红军应有的援助,加之内部又不团结,于1934年1月宣告失败。蒋介石在镇压了福建事变以后,回过头来更加紧围攻中央根据地。当反‘围剿’战争进行到一年时间,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左’倾错误领导人再次拒绝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的正确建议。这样,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只有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这一条路了。”^[2](引文中的着重号是笔者加的。)

上述引文中的“拒绝上述正确主张”、“再次拒绝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究竟拒绝谁提出的主张?没有回答。显然,本书编者是有意识回避了。

由郑德荣、朱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对此问题也是采取回避的办法。

“在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被调到

福建剿共前线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的感召下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公开宣布反蒋抗日,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这时,反‘围剿’已经无法在内线解决,然而‘左’倾领导者并没有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人包围圈,转入外线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地区、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藉以迫敌回援其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政府,扭转战局。他们完全抹杀福建事变的积极意义,甚至认为那是对人民的‘欺骗’。当国民党反动军队到福建去打十九路军时,‘左’倾机会主义者无动于衷,不组织出击,让其畅通无阻地通过根据地,这样不但没有把中间势力团结到自己的周围,而且在军事上也坐失良机。此机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当战争打了一年之久,红军已不利于出浙江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以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上述引文中的“此计”是谁提出的“计”?编者没有说,但从引文(即“此计又不用……等语)看来,是毛泽东同志的原话,好像是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计”。^[3]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史讲义》,对此问题的叙述前后也不完全肯定:

“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毛泽东等坚决反对‘左’倾的错误方针,多次提出粉碎敌人‘围剿’的正确建议,1933年11月,被调到福建‘剿共’前线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政策的感召和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推动下,公开宣布反蒋抗日,在福建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和红军达成反蒋抗日的协定。党内许多同志提出:应利用蒋介石抽调军队在福建的机会,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堡垒线,进入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

后面又说到“1934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打了一年,围剿不能打破。在这十分紧急的时刻,毛泽东提出,红军主力应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然后待机消灭敌人的主张。”(以上引文内的着重号为笔者所加。)^[4]

从上述引文中看出,开头是说“毛泽东等坚决

反对“左”倾的错误方针”,中间是“党内许多同志提出”,后面则是“毛泽东提出”,究竟“毛泽东等”除毛泽东外还包括哪些人?“党内许多同志”指哪些同志?编者对此问题也是含糊不清的。

由上海市高校《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编写组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对此计划的提出是说“有的同志”,这“有的同志”指谁?非常含糊。请看下面引文:

“1933年11月福建事变时,有的同志曾向中央建议,即以五军团坚持中央苏区斗争,集中一、三军团和其他部队出赣东北苏区、依方、邵根据地来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来掩护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和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1934年秋,红军已撤出了中央苏区,转移到郴州和宜春之间时,有的同志又向中央建议,派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挺进、威胁长沙,迫使蒋军由追击行动改变为进攻的布置,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消灭之。可是,这个正确的建议又未被采纳。这样,打破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只剩下长征一条路了。”(引文中的着重号为笔者所加。)[5]

上面所举的几种不同版本的关于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应该出击苏浙皖赣区计划是毛泽东所提出的根据是毛泽东同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毛泽东同志在该文中是这样总结的:

“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6]

我们知道,毛泽东在这段话中并没有肯定指出这个向苏浙皖赣进军计划便是他提出的,也可能是

总结别人的经验而写的。这里,我们可以《毛泽东选集》为该文写的注释为证,注释上说:“毛泽东同志的这篇著作(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引者),是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写的……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在军事问题上一场大争论的结果。”[7]因此,说向苏浙皖赣地区出击的建议是毛泽东同志所提根据是不足的,只能说是总结别人经验的结果,但总结别人的经验不等于是他提的。

那么,此计划究竟是谁提出的?笔者认为这个向苏浙皖赣出击的建议是彭德怀同志提出的,有彭德怀的自述为据。他说:

“在福建事变时,我向中央提了一个建议,即以五军团坚持中央苏区斗争,集中一、三军团和其他部队出赣东北苏区,依方、邵根据地来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来掩护事变,推动抗日运动和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后来,中央认为我的建议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1934年秋,我红军主动撤出了中央苏区,是完全正确的。但到达郴州和宜春之间的时候,我提议派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由追击行动而改变为进攻的布置……可是此建议如石沉大海,既无批评,也无答复。”

这里,彭德怀说得非常肯定,所以向苏浙皖赣边区进击,以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建议就是他提出来的。[8]彭德怀这篇自述式的《往事回忆》是文革时他被揪斗、身陷囹圄时写的。因此,其真实性、可靠性不容置疑,否则,不是“罪加一等”吗?

参考文献:

- [1] 胡 华. 中国革命史讲义[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 [2] 何 沁, 张静如, 周承恩, 闻立树. 中共党史讲义[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
- [3] 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M]. 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4.
- [4] 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M]. 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4.
- [5] 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 [6] 毛泽东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 [7] 毛泽东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 [8] 彭总光辉的一生[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Who was it that Suggested that the Main Force of the Red Army should Hit Out in Central Hunan and Jiangsu—Zhejiang—Anhui—Jiangxi Border Areas

CHENG Xiao-rong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Nanchang, 330002, China)

Abstract: In the Fifth Encirclement and Extermination Campaign by the enemy, the Red Army suffered heavy casualties due to the wrong proposals by “Left” opportunism. The base area was increasingly reduced and “Fujian Incident” happened. In light of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e enemy and the Red Army as well as the changing domestic situation,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main force of the Red Army should take this chance to move to Jiangsu-Zhejiang-Anhui-Jiangxi border areas centered around Zhejiang, thus forcing the enemy to return to Zhejiang and helping to maintain the momentum of “Fujian Incident” so as to push forward the anti-Japanese and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 and defeat the enemy's Fifth Encirclement Campaign. But the proper suggestion was rejected by the “Left” opportunists. A year later, it was again proposed that the main force of the Red Army should move to Central Hunan, luring the enemy in Jiangxi to Hunan and wiping them out. Who was it that raised the suggestions? Experts on the Communist Party's history are not entirely agreed. This paper presents its argumentation based on historical facts.

Key words: counterattacks on the Fifth Encirclement and Extermination Campaign; “Left” opportunism; situation; Fujian Incident; attack; anti-Japanese and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